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黄德鸿

自选集

HUANG DE HONG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黄德鸿 | 自选集

HUANG DE HONG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德鸿自选集/黄德鸿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364-6

I. 黄… II. 黄…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572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364-6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编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 赤心报国，桃李芬芳

1916年我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一个非常重教的地主家庭，读私塾时祖父黄昌治就为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宁远书屋”，请最好的先生教授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灌输“学海无涯勤是岸，青云有路志为梯”之类的思想。所以在读私塾阶段便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培养出浓厚的求知兴趣，思想上印下了志、勤、恒的印记。因而养成了奋发向上、好学深思的品格。

进入初中阶段，受到更多老师的关怀和悉心教导，特别是国文老师谭国文，是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他才华满腹，忧国忧民，有崇高的追求，认真授课，热情指导课外阅读，指导我们读鲁迅的《彷徨》、《呐喊》，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等，还有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名著。

受重教家庭的熏陶，名师的教诲，进步作家名著的影响，使我丰富了知识，思想感情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对我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36年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广州名校广雅中学，开始了我现代求学的生涯。在广雅中学受到名师的教导，特别是国文教师梁同寅的教导，受益终生，他讲授的曹丕《典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我牢牢地记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只有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才可以垂之久远，嘉惠后人。我要上大学，做专家教授，致力于教学科研，走科学报国，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人生目标就是以此为起点，形成一条人生的主线，贯彻终生，矢志不渝地追求。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1938年，我从广雅中学毕业时，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一方面是经营药材的父亲，希望我子承父业；一方面是国家的召唤，当时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每一个有爱国心、民族感的青年，都热血沸腾，国家在召唤青年为国家出力，为人民解困，救国救民。

当我看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系招生时，我认为社会学可以启发民众的觉醒，我还想到曹丕《典论》中“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的古训和科学救国的近代观念时，毫不犹豫地报名，录取后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学者”。

在中大读书期间，一方面发愤读书，学习救国救民的理论知识，一方面关心抗战局势的发展。入学不久日军进犯广东，逼近广州，中山大学在战火硝烟中疏散，我被迫中断学业。目击时艰，对日军的野蛮侵略，对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反动统治，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坚持抗战有了一定的认识，认识到国家和民

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于是我返回故乡阳江参加革命。1939年春中共“广州外县工委”的黄文康到阳江发展党组织，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组织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寇的侵略。

1939年中山大学在云南复办，经阳江党组织的批准，带着在抗日战争中遇到的问题，回到中山大学继续求学深造，从事社会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3年参加全国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社会保险科，专门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

1944年联合国社会福利机构招考，在上百名的应试者中，我以优异成绩获选，成为9名被录取者的第6名。亲友们都为我高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竭力劝我到联合国总部赴任。当时我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希望进一步对社会保险和国民福利一类的问题的研究，对改变贫困的人民、混乱的社会和落后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1945年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我怀着胜利的喜悦，迎接抗战的胜利。作为一个科学报国的追求者，我希望有更好的条件进行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可是国民党倒行逆施，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家又陷入战火之中，国民政府大发国难财，国家和人民又陷入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灾难沉重的祖国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我渴望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国家走上富强。国富需要人才，民强需要

教育。因此，我拒绝到台湾，放弃到联合国总部赴任，又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投入到解放战争。当年我 32 岁，被聘为副教授，主讲社会保险、社会立法和社会事业等课程，同时进行科学研究，撰写不少的学术论文，汇集成《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论文集》出版。

新中国诞生之初，满目疮痍，百业待兴，国家最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最需要教育，大规模的建设，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掌握，需要教育。新中国的诞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春天。所以，我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50 年代，在新中国的蓝天下，刮起一场妖雾霾雨，科学教育被中断，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我更是在劫难逃。我既没去联合国总部赴任，又没去台湾，有的人不理解，那么好的机会，令人垂涎的美差，黄德鸿不去，而留下来做副教授，一定是潜伏在大陆另有更重要的任务。一片丹心的我，被一些人想当然地推理成了嫌疑分子、历次政治运动的革命对象。反右斗争期间，对我进行反复的内查外调，查不出特务罪行，也不放过，被定为“右派边缘人物”。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教育遭到空前劫难，我也不能幸免，仍然是过去历史上的疑点。“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我成为清理对象，对我加大内查外调的力度，同时进行抄家，查不出特务证据，就对我积累大半生、伴我大半生的图书、资料、文章手稿进行焚烧，最令我心痛难忍的是，耗费多

年心血翻译出来并将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英国社会保险法大纲》，也被付之一炬，我当场晕倒在地。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坎坷，但无论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中，我从未动摇过科学报国的志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企业管理的X理论对人性的假设是不对的，Y理论也是不适合的。应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理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扫除了妖雾阴霾，为科学教育开创了明媚的春天，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一扫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乌云，我又青春焕发，更有决心为振兴教育、振兴科技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献身教育，不懈奋斗，成功立业，惠及后人。

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我的教学科研分为两个时期。50年代以前主要是从事社会保险的教学科研。50年代以后，我曾在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暨南大学时兼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的教学研究。

新中国的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革命根据地留下来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来自解放初期引进原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我国的工业企业管理理论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以后，经过“大跃进”初期的实践，在60年代开始形成，这就是“工业十条”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一些经验。十年浩劫把这些条文也冲垮了，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

失。

何时才能够总结出一套符合我国的现代经济管理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企业发展？经济学者怎样为中华腾飞做出贡献？怎样培养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人才？这些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1959年调到暨南大学以后，一面从事工业经济的教学工作，一面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研究，从广州的工业企业开始，探索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年轻人一样挤公交车，顶烈日，冒风雨，跑工厂企业，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广货要打入全国和世界市场，要用哪些开拓、应变、生产、销售、循环策略？广东要起飞，应选择什么样的预测模型？……汗水和心血凝成一项项的成果，撰写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后对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技术引进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回顾6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我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学方面：志、勤、恒。

治学是长期的而非一朝一夕之事业，因此，必须持之以恒。正如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精辟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哪三种境界？他用三节宋人词形象地概括：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三境界”可理解为三

个阶段——面对现实、痛下决心、融会贯通，这即治学的全过程，从现实生活中确定个人奋斗目标，下定决心，艰苦钻研，终于有志者事竟成，豁然贯通，达到预期的目标。

治学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品、人格和学风培养。自幼养成的志、勤、恒的学习态度，从教以后，很自然地成为我的治学态度与作风。在学生时代刻苦学习打下一定的根底，从教以后丝毫没有放松学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榜样作用和影响力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作为教师不仅对学生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品、人格和学风，要使学生懂得，做人与治学的关系，要先做好人，尔后才能做好学问。做人和做学问很好的结合，才能成才。做人有了根基——忠诚笃信，做学问才有根基——志、勤、恒，做学问的根基打得牢，才能站得高。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从博到精，没有扎实广博的根基，就很难取得高精深的成就。

我长期用“明确目的、打好基础、重视实践、探索创新”这十六字自勉和勉励学生。我在招博士生时，坚持三条要求：一是人品好，忠诚笃信；二是学习勤奋，有创新意识；三是肯吃苦，持之以恒，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有了这三条，做学问时可以防止：信手拈来，随手即用，为炫耀自己知识渊博而滥用资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学术研究空疏无力。

打好基础非一朝一夕之功夫，必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如何读书，除了心到、眼到、

手到、脚到之外，还要有一套读书方法，我常向学生推荐“教科书循序读，经典著作反复读，材料书尽量读，修养书定时读，工具书用时读”的方法。

我推崇蔡元培先生的“宏约深美”的治学思想，作为一个学者，知识面要宽广，由博返约，博采众长，深入研究，最后达到完善的境界。我一生刻苦读书，博览群书，仅摘录、制卡片、做札记、剪报所积累的资料，有十多箱，数百斤。

治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如此才能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过来促进多读书，读好书，大胆探索，大胆创新。

治学还应该独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和思结合起来，独立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推陈出新。

第二，育人方面：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育人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必须有科学的战略思想、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

培育人才，首先要有质量第一的观点，保证培养的学生政治思想品德好、专业能力强，体魄健康，即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育人者要确立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思想和品德，“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再次，要树立教学相长的观点，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学实践中，教学相长，优势互补，既培养一代新秀，也丰富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育人者要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先垂范，我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我就尽力创造条件，有目的、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调查、学术活动和学术团体，拓展他们的视野，开阔他们的思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我对学生宽厚诚恳，不以学者傲人，爱生如子，我给以真爱，学生给我以真情，他们尊我为德高望重的亲人，彼此建立深厚的情同父子的情谊。他们毕业后，人离开学校了，空间上分开了，但师生的心仍连在一起，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社会地位提高了，社会影响扩大了，但师生关系不变，他们对老师的敬重和爱心不变，他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 85 岁生日时，所有毕业的博士为我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并请广州有名的雕塑家为我雕塑一尊高 60 厘米的半身铜塑像，作为永久的纪念，铜像所包含的深情和厚爱就像铜像一样永存。

更令我感动的是，我的人品、人格和学风，不仅被我的弟子们认可，而且有的还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有的学生抱着幼子来，“让黄爷爷摸摸顶，长大后像黄爷爷一样做人、读书、成才”，有的教育正在读书的孩子，“要像黄爷爷一样，做好人、读好书、成大才，为国家做贡献”。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终生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培养大批的学士生之外，培养硕士生 33 人，博士生 24 人，他们都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层骨干力量。他们之中有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副市长、90 年代初已闻名全国

的中国第一个博士镇长（现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一生不慕功名利禄，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生活享受，不喜迎送，把心血倾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上。60年甘为人梯，让我的众多弟子登上经济研究和各项事业的高峰，我为之耕耘50多年的产业经济、企业管理事业，经过他们的努力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将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弟子们在事业上的成功发展，是我教学科研生命的延续，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的心境也因此而常青不衰。

第三，学术观点和主要成果。

我一生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所以为国家培养的一批批的有用人才，是我教学科研成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改革开放以后，结合广东经济实际发表论文60多篇，主要的有：《广州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潜力和提高了的途径》、《广州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重点和保证措施》（获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中小型企业在新形势下系统营销策略》（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工业结构对科技战略发展的影响》（获广东科技情报成果奖）、《加强教材建设，培养专门人才》（获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广东工业营销新局面》（获广东省企协优秀论文一等奖）、《广东技术引进一体化及其对策》、《论广东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调整措施》、《论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深化企业改革的构想》等。这些论文发表后，

对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

同时我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撰写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1976年参加“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该《词表》成为我国“汉语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第一部文献，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3年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和分篇主委，该书获1986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参加编写的《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教材，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荣誉奖。和他人合著出版了《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管理学纲要》，获广州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企业领导学——理论、方法、艺术》，获1992年广州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出版《实用劳动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云冠平教授合译《工业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出版了《20年的学术回顾》（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我的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一）倡导对工业投资效果的研究

60年代初，我便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要提高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应考虑几个主要因素：1. 短期内为社会提供产品的基本建设投资的经济效果与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提供社会产品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正确结合；2. 不仅要直接计量投资对象的经济效果，而且还要考虑其相邻部门的投资经